

## ■ 探路新型城镇化

在众多的业内专家看来,城镇化的很大障碍是制度性问题,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道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充分互动。

#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加大制度变革

本报记者 牛建宏

##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中央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和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新型城镇化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是,也无可讳言,中国城镇化建设在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

中国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方向在哪里?如何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如何打破城乡户籍藩篱,逐步推进户籍改革?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成为新一轮“造城运动”,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如何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同时,在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以创造性的发展思路推进城镇化,积极探索,或以大城市带大郊区,或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这些探索和做法,或承袭和发展传统,或另辟蹊径,都找到了适合的发展路径。它们宝贵的经验,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和依托。

正是基于对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探索的关注,本刊特开辟“探路新型城镇化”专栏,报道新型城镇化新的发展动态和现象,关注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土地、户籍、福利等制度变革,聚焦一些地方先进的典型和经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助力扬帆。今天是第一篇,敬请关注。

## 制度变革必须而紧迫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已不是‘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制度的变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4月20日在由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发展高层论坛·2013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本报记者说。

**路径:实现发展模式转变**

在李铁看来,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城镇化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提升的转变,也就是说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定居落户难的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如何坚定不移地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李铁说。

以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例,李铁认为,改革的难点在于,原有的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体制已经演化成为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对外封闭的新二元结构。

例如在上海,外来人口已占常住人口的40%左右,如果给所有的外来人口落户,那会对上海的财政产生巨大的支出压力,也会导致城镇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降低。

从降低改革难度的角度出发,李铁提出,应先把约4000万举家迁徙人口作为改革突破口,各级城市率先放开落户限制,因为这部分人对原有居民的利益损害不大,改革阻力较小。然后,分期分批解决教育、社保、住房、医疗服务等公共福利,逐步消除差距消失。

户籍管理制度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制度性难题之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镇化的很大障碍是制度性问题。当前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道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充分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是由政府为主导推动的。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发展方向。”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胡志刚对本报记者说。

在胡志刚看来,正是由于城镇化数量发展的行政推动,而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们的政府又无所不能,这就导致城镇化水平“虚高”,体量“虚胖”。

“我国城镇化要对过去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制度进行改革,让市场和社会成为城镇化的主导。一方面,政府要从要素市场中退出来;另一方面,城镇化要减少政府对城镇规划的干预,多动员社会机制参与到城镇化发展建设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

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认为,我国高速发展给城镇化提供了机会,当前已经具备了改革现有不合理制度的条件,应通过加快制度改革来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路径:实现发展模式转变**

在此次召开的中国城市发展高



层论坛·2013上,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在制度创新上,要以科学发展为基本理念,从产业布局、农民市民化、生态环境、城市规划、金融体制等方面出发,注重制度创新的整体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构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合力。

而对于新型城镇化中的战略布局上,与会专家认为,要加快城市群的发展,要形成合理的城市群内部结构体系,同时更要未雨绸缪,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各种“大城市病”的爆发。

记者了解到,在制度变革方面,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山东七个城市已实现“租房落户”,尽管各地对租住时间要求不尽一致,但落户条件从“有住房”转变为“有房住”,大大降低了落户门槛,对想拥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再如浙江拟试点27个经济强镇“撤镇设市”,力图解决“人大衫小”的苦恼,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避免城镇经济优势逐步丧失。

“走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关键是要落实城镇发展模式从粗放扩张型向资源集约型的转变。”李铁说。

在李铁看来,我国城镇政府的行

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基础设施投入和管理机制、土地出让的收益分配机制等,都从制度上支持了城镇政府粗放扩张的发展模式和决策中的短期行为。

因此,李铁建议,改革城镇管理体制,建立相对平等的城镇发展机制,防止资源通过行政等级,过多地被集中到高等级城市。

“要调整政绩观,从制度上促进政府管理者把短期行为转向长期行为,把工作目标对准公众和外来人口,真正地从制度上实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李铁说。

在胡志刚看来,实施新型城镇化既要注重城市及城镇的建设与扩张,又必须守住低碳、绿色、环保、节能、省地等底线,既要注重拓展各种产业,提高城市及城镇的综合承载力,又要吸纳非农业人口,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水平和城市及城镇的经济活力;既要发展城市及城镇,又要发展农村……

“可见,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按规划、按规范、按制度、按程序循序渐进地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章立制,守住规矩,依法行政,按章办事。”胡志刚说。

**路径:实现发展模式转变**

在此次召开的中国城市发展高

## ■ 中国产业安全系列谈⑩

## 如何保障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产业安全?

丁锋

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年将增长50%,每两年便将翻一番,而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中国信息产业安全将面临新的形势和变化。目前,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五大核心技术领域,即高性能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技术、网络交换技术和信息资源库,全部被国外IT巨头垄断,严重威胁中国信息产业安全。基础软件技术储备不足、高端硬件核心技术匮乏和高端技术人才流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们的软件开发主要集中在应用领域,从国内软件著作权登记和软件产品登记情况看,操作系统的软件开发技术储备亟待提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应用类软件约占登记总量的83%,嵌入式软件约占登记总量的17%,中间件软件和操作系统登记相对较少,占登记总量不足0.3%。在移动终端领域,操作系统的研发技术也不容乐观。缺少基础软件技术储备将直接导致信息产业安全存在严重的隐患。

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代,如果不能掌控核心技术,将

在信息化竞争中进一步落后,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我国在高端传感器方面,尤其是将感知、传输和处理集成到小尺寸芯片中的高端微机电系统方面,和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IT企业如果在高端服务器核心技术领域不能实现自给,产品不能掌握自主,必将导致我国核心信息资源服务向国际IT巨头的集中,将对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据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若人才流失率不高于10%,留学人员回国率不低于70%,则该国或该地区的留学人才尚属于安全状态。然而目前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率远远低于上述标准,大量高端人才或潜在高端人才流失。

目前,美、俄、英、法、印、日、德、韩等国家都将网络空间部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甚至拥有网络安全部队。中国的信息产业如果完全依赖外部技术,我们的产业安全将处于风雨飘摇,任人宰割的境地。从全球信息化核心技术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信息技术要在大数据时代缩小与欧美的差距,仅仅依靠国内各大公司、科研单位单方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重大突破。因此国家必须统一协调部署,集中优势力量,在现有基础上加大投入,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实质

性进展,形成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体系。

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引导与推动,强化信息产业政策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各方资金投入,分担企业的资金压力和创新风险。

要发展产业集群促进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作用,推进基础软件研发和高端核心硬件重点专项的落实,加快成果转化,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

要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信息产业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优化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建立多层次的适合信息产业技术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一批高水平科研带头人,在信息产业科技发展重点专项实施过程中注重培养一批创新型的科技人才。

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兴起为信息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的产业安全敲响了警钟。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才能在关键技术上摆脱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将信息产业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博士后)

## ■ 业界声音

## 标准为王成中式快餐扩张密码

——专访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光启

本报见习记者 陈梓睿

近十几年来,中餐连锁业也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品牌,可大多数只是昙花一现。然而,合商贺光启和他的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从1998年成立,迄今已走过15个年头,并以每5天开一家店的速度快速奔跑,在不被业内看好的“中式快餐”领域创造了一个传奇。近日,记者近距离接触了贺光启和他的呷哺呷哺,共同探索中式快餐企业的发展之路。

### 高品质打造中餐核心竞争力

如今,西式快餐在我国的消费人群主要定位在年轻群体,并且近年来为了迎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性,西式快餐逐渐推出了具有中餐特色的食物。快餐巨头百胜还收购了小肥羊作为打入中餐市场的一个突破口。面对西餐的迅速扩张和中餐的激烈竞争,贺光启认为品质应成为中餐的核心竞争力。

众所周知,“快”和“标准化”成为中式快餐的两大拦路虎。尚普咨询食品行业分析师指出,西式快餐的优点是在量上做到了标准化,并且比中式快餐更加方便快捷。但中式快餐由于食物上仍然保持了中国人的饮食特色,因此标准化不能做到像洋快餐那么好,也就更不容易控制成本和标准化管理。

在贺光启看来,中餐本就难以量化,既然锁定了“连锁化”,企业的标准化建立就显得非常重要。他仿效自己原来从事的珠宝生意,让呷哺呷哺从工厂开始起步。何为呷哺工厂,贺光启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强大的中央厨房配送系统,加工调制食材的工作统统交由中央厨房完成,从食材到用具,甚至一根牙签都由总部中央厨房统一采购配送,而分店只需要一个具备“冷鲜”和“速热”两大功能的厨房即可。这样可以确保所有分店各个环节均达到统一的高标准、高质量。

贺光启认为,与西餐相比,中式快餐的原料更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且健康,但中式快餐在食品的供应链条上做得比洋快餐要差。这种疏漏和缺陷很可能导致中式快餐在食品安全方面不及西式快餐。因此,中式快餐应该在菜品的品质上下重功夫。这也是呷哺餐桌上都是来自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的根本原因。

在企业的不断改良下,呷哺逐渐占领了市场的顶端。对此贺光启认

为,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他说,通过品质去赢得食客口碑,是最有力的保障。

### 将标准化延伸为企业的DNA

食客走进任何一家呷哺店面,店面外观内饰风格、菜品底料的外形口感种类都高度一致,几乎感觉不到差异。贺光启表示,标准化经营是以连锁化为目标的呷哺公司管理的重要原则,而这种模式的建立也对呷哺的迅速壮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人们感觉到呷哺是有自己DNA的。

众所周知,“快”和“标准化”成为中式快餐的两大拦路虎。尚普咨询食品行业分析师指出,西式快餐的优点是在量上做到了标准化,并且比中式快餐更加方便快捷。但中式快餐由于食物上仍然保持了中国人的饮食特色,因此标准化不能做到像洋快餐那么好,也就更不容易控制成本和标准化管理。

在贺光启看来,中餐本就难以量化,既然锁定了“连锁化”,企业的标准化建立就显得非常重要。他仿效自己原来从事的珠宝生意,让呷哺呷哺从工厂开始起步。何为呷哺工厂,贺光启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强大的中央厨房配送系统,加工调制食材的工作统统交由中央厨房完成,从食材到用具,甚至一根牙签都由总部中央厨房统一采购配送,而分店只需要一个具备“冷鲜”和“速热”两大功能的厨房即可。这样可以确保所有分店各个环节均达到统一的高标准、高质量。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曾定义了连锁企业最大的特点是“简单”和“复制”。贺光启对此认为,标准化经营的内涵里包涵着服务标准化、食材标准化、物流标准化等,公司的任何行为细节和思想细节都应有企业自己的标准。标准化就像是一个模具,模具刻好之后,复制就容易得多。

“企业的成功是因为自身拥有标准,然后将标准延伸为自己企业的DNA,才能在中国快速地复制发展。”贺光启说。

## ■ 产业丛谈

## 如何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以济南市为例

程禹铭

近年来,济南市以推进城郊型、都市型农业建设为主攻方向,实施特色优势产业振兴规划和品牌战略,推进生产体系、支撑体系和多功能产业体系建设,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和主要农产品供应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和产业化经营体系加快形成,休闲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成效明显,现代农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但从总体上看,济南市现代农业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与先进地区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问题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

产业发展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与先进地区比,与国家、省级示范区的标准比,济南市农业基地和园区建设在发展理念、推进措施、规模档次等方面都有不小差距。

特色产业效应不显著,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强。济南市农业产业种类较齐全,但在省内叫得响的特色产业不多。济南市已注册4346个涉农商标,但地理标志、省市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等知名品牌只有65个,仅占注册总数的1.5%,品牌农业发展整体质量不高。

农业科技服务能力不强。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在位不在编”的现象仍较普遍。

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机制创新力度不够大。制约济南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集中体现为地散、人散、投入不足。“地散”就是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而分散。目前济南农户均经营耕地5.4亩,只有全国水平的73%;农村土地流转面积68.1万亩,仅占全市总耕地的13.9%,而杭州、武汉等兄弟城市已接近或超过40%,河南、广东的部分县级市高达60%—70%。“人散”就是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加入各类合作社的农民约25万户,只占全市农户数的25%左右,而成都市农业生产组织带动的农户数已超过60%。“投入不足”仅以农业补贴为例,2012年全市农民人均获得各类农业补贴不到180元,占纯收入的1.5%。二是劳动力素质不适应。目前全市从事农业的75万劳动力中,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7.1%。三是社会化服务不到位。为农民提供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营销、质量安全监管等服务的组织严重不足。

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理清发展思路,完善发展规划。今后一个时期应把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特色精品农业、设施高效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作为重要目标和方向,尽快制定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以及与之相衔接的专项规划。

进一步创建农产品品牌。以农产品认证为抓手,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建设主体,大力开展品牌创建和农产品深度开发,推进区域品牌发展。

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参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推动龙头企业与园区、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结合机制。积极推进以优质高端农产品观光休闲为主,集约化程度和科技含量高的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园区建设。

培育发展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通过科技特派员、特色农业培训中心、科技服务超市、庄稼医院、专业服务公司、全程托管服务等多种形式,大力培养“职业化农民”,促进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到田到户;培育发展一批种苗、植保等专业公司;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优化升级和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积极发展农超对接、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等新型流通业态。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力争到2017年、2020年全市流转土地规模占全市总耕地的面积分别达到50%和70%。二是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加快组建市县乡村四级上下贯通、平台统一、操作规范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三是进一步创新土地流转促进机制。借鉴湖北、成都等地先进经验,健全利益分配、市场运作、风险防范和政策激励等有效促进机制。

(作者单位:济南市政协)

## ■ 八面来风

## 养老服务业 规模将超4500亿

本报讯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日前在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表示,中国养老服务产业规模预计将在2015年超过4500亿元,是当今中国老龄社会中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

博览会是5月1日至3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由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有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辖市(县)的政府组织,以及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研究机构、服务机构、联盟组织和生产企业组团参展。

博览会结合老年人居住环境模式研究、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老年人信息化服务模式研究、养老服务管理与服务人才培训模式研究、养老服务品牌推广研究与开发等养老服务的重大课题展开,力图把博览会打造成感恩社会、关爱老人、改善